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

——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

主编 刘桂生



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

——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
“五四”启蒙思想

主 编 刘桂生

副主编 朱育和 张步洲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置于世界近代思潮冲突更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五四”为中心，探讨了中国启蒙思想的源流、演变及得失，发掘并运用了一批新的史料，得出若干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全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既是一本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的学术专著，又可作为高校教学用书和青年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自修读物。

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

——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

主 编 刘桂生

副主编 朱育和 张步洲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北京昌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9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302-00510-9/K·5

定价：2.80 元

序

近来，理论界（主要是哲学界和文艺界）非常强调主体意识。有人认为哲学上的认识论比本体论还重要，划分哲学阵营应该以认识论为标准。在认识论方面，有人认为反映论是错误的，是列宁的创说，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有的人甚至认为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根本无法认识，因为认识离不开主体。我不是专搞理论的，但对于马恩关于意识是由物质所产生并为物质世界所决定，人们应该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等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而列宁所反复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反映论，与马恩的论点并无不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很强调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的，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家。但他们强调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

我们史学界对主体意识的讨论还不够热烈，但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究竟历史有没有它的本来面目呢？历史是否会因为看它或写它的人不同，是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改变了自己的面目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就不可能成为科学。如果历史真的如胡适所说的那样象一个姑娘，可以随意打扮，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我们史学界有些人，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甚至于主张建立“应用史学”。他们不了解：历史科学是从根本上有益于人而不是临时的应用药方，而一时有用的“应用史学”则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尽管他们的动机很好，但结果他们和胡适走上了同

一条道路——历史唯心主义之路。例如当中苏友好时期，在他们的笔下，沙俄似乎不是帝国主义，至少比其他帝国主义要好些；而一到反修时期，苏联就变成了新沙皇。又如对美国，一个时期强调反美，连美国曾经是反法西斯的盟友也不敢提了；而到另一个时期，强调中美友好，又连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也不敢再写了。其他的事例还很多。这哪里是研究历史？这是在玩政治，或者是象玩政治那样玩历史。

我们认为：历史有其本来面目，而且这个本来面目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例如秦始皇曾经灭六国，修长城，筑阿房宫，焚书坑儒，等等，这些事实是万古不变的，尽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可以不同。又如自五代以后，中国女人缠足渐成习俗，直到民国时期这种恶习才被废除。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以小脚为美，而民国以后又以小脚为丑。尽管对它的看法是那样的不同，但小脚这一历史存在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只有承认历史存在的客观性，人们才能从历史发展中寻求到客观的规律。例如：因为有了无数次人民反抗暴政的历史事实，唐代的统治者才能总结出“民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有了女人缠足又放足的历史，人们就能总结出一切摧残人性的措施必将为历史所淘汰的规律。不错，后人如果有正确的方法，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可以超过前人的。但这并不是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所以历史这门科学，不仅因为历史的发展无穷尽，因而对它的研究也无穷尽，而且就是对以往历史的研究也是无穷尽的，只有经过不断的研究，才能揭去一切伪装，探寻出历史的真面目及其发展的规律。

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最近写出了一本新书，名叫《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五四”启蒙思想》。他们很下功夫，发掘并运用了不少新材料，不仅从纵

的方面探寻中国启蒙思想之根，而且从横的方面，把中国纳入世界范围内来考察，从西方寻求中国启蒙思想之源。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源有流，而这些源流对中国的启蒙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对这些都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因此他们的书不仅有新材料，而且有新观点，从而使人们对中国启蒙运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以为在历史研究中，只要有益于探求历史的客观真理，一切有效的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但任何方法，都一定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益。那种希图用省力气、走捷径的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我看是很难有重大成就的，更不可能攀登到历史科学的光辉的顶点。我认为刘桂生教授等同志写这本书是出了力气的，方法也是可取的。但效果究竟如何？应该由同行的专家和读者们来评定。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很难开口。因为我是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刘桂生共事多年，所以我愿意负责来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并望对其中的论点开展讨论。我对书中的论点只能表示有很大的兴趣而不能表示赞成或反对，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抱这种态度来推荐这本书，将更有利于讨论的开展。谨以此为序。

李 新

1989年2月2日

目 录

序

艰难的历程

——几点想法（代前言）……………（1）

在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下传统的突破与重铸

——独具特色的康有为启蒙思想体系……………（16）

（一）汉宋调和：旧学的困境与生机

（二）以西方近代精神重新解释传统

（三）义理之学：寻求人的解放

（四）经世之学：近代社会历史观念

（五）启蒙的思想光辉

民族危机催迫下启蒙思想开始转向

——严复思想与斯宾塞学说……………（57）

（一）接受社会进化思想，提出“三民”学说

（二）播下实证主义科学思想的种子

从日本吸纳西学

——梁启超《新民说》与民族国家意识……………（81）

（一）《新民说》的形成

（二）《新民说》的理论形态

（三）思想的转向

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

——《新青年》的先声《甲寅》月刊……………（99）

（一）政制移植的争论与偏重“国权”的趋向

（二）在挫折和失败中寻找新的出路

（三）启蒙思想的复苏

从“人权”到“民主”

——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139）

- （一）民主思想的前期理论形态
- （二）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转变
- （三）启蒙思想的高潮

科学的权威与科学的局限

——“五四”时期陈独秀科学观述评……（168）

- （一）科学与人的主体性并重：陈独秀早期科学观的启蒙色彩
- （二）物质一元论与实证主义调和：科学观的信仰化倾向
- （三）唯物史观的引入：陈独秀科学观的归依
- （四）科学的权威与科学的局限

中华民国缔造者的探索

——孙中山“觉民”思想述析……（185）

- （一）困扰与省觉：孙中山对国民觉悟问题的认识发展
- （二）行为“启蒙”与思想“启蒙”：孙中山解决国民觉悟问题的途径
- （三）个体与群体：孙中山“觉民”思想的内在矛盾
- （四）时代背景与现实选择

中国启蒙思想的新取向

——西方文化危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206）

- （一）西方文化危机与新文化运动的碰撞
- （二）四组观念的变换
- （三）新的取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后记……（242）

艰难的历程

——几点想法（代前言）

刘桂生 朱育和

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在中西文化长期碰撞之中，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催迫下发生、发展起来的。比之欧洲的启蒙运动，它不仅晚了200年，而且在其以完全意义上能与欧洲相当的形态——即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不久，便同当时十分剧烈的西方文化危机迎面相撞，这之后，运动的主要内容与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意义的启蒙运动在中国沉落下去了。仅此便足以令人想见，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相比，必有很大的不同。

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中国启蒙运动做纵的历史考察，同欧洲启蒙运动做横向比较，在在都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启蒙运动独具的特色，同时也令人强烈地感到，它的被扭曲，和远远没有取得成效，也许就是它与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在我们看来，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简言之，便是人权觉醒、人格独立和理性自主。启蒙运动最深层的要求便是使这些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准则。以此来衡量，无疑地，启蒙运动在欧洲是成功，在中国则不能不说是失败。如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一样，在欧洲成功了，在中国失败了，是人所共见、共知的事实。重要的是对所以致此的根由如何认识。

这里，仅就其荦荦大端，略陈我们的认识如下。

（一）迥异于欧洲的封建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中国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面对的对象大不相同

在欧洲，封建统治一般与教会势力相结合。政权往往要依凭神权。二者既勾结又相矛盾。启蒙运动首先要反对的是神权、神本主义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表现——教会。教会利用神权和人的迷信对人和人的理性实行的统治、压制与摧残是极端严酷的，而其荒谬与虚伪也是比较裸露的。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首要的斗争对象，神权、神本主义和教会，是强大而凶狠的，同时，应当说又是相对虚弱的。

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在精神上的凭藉是礼教，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整套礼教规范。整个社会便是遵循着这种人伦纲常，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编织成一张重重密密的网络。人，一生下来，便在这张网络中有了固定的位置，一般难以改变。在这里，注重的是人在这张网络中的位置——社会身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独立的人格。人的一切社会性的行动，不是受命于理性，而是制约于礼教规范。无所不在的礼教规范，像大海一样，吞噬和淹没了一切理性活动与人权要求。中国的启蒙运动，只有摧陷廓清这样的礼教规范和这样的社会网络，才能够肯定人的权利，解放人的理性。

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启蒙运动的敌对力量，犹如盘丝洞中的蛛网，看起来是细的、软的，但却是密密实实，十分坚韧的，比之欧洲的神权等等的那一套，似乎要顽强得多，远不是抡一通金箍棒，舞一番八齿耙便能打破的。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启蒙思想，同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一较量，事实上没能冲决它所构成的封建网罗，根由之一，就在于此。

当然，中国启蒙运动的基础与主体力量，即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极端弱小，是更具决定性的原因。而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萌生晚，发展慢，同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特别紧密的结合，以及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无疑有重大的关系。这种在全世界颇具特色的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得以建立与维系，又大大得力于上述的礼教规范与社会人伦关系，这是无须赘言的。所以，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中国启蒙运动未能成功的重大根由之一。

（二）深重的日趋紧迫的民族危机

在中国，启蒙思想的萌发与传播，几乎与民族危机的加剧相伴而行。当它以运动的形态，旗帜鲜明地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冲击的时候，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已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的激起无限悲愤的现实。所以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便同爱国运动几乎合二为一。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新文化运动借爱国运动而得以更为迅速广泛的开展，运动的倡导者们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以至敬仰。封建统治势力，由于它的误国、卖国，而加速了崩溃，专制与高压不得不有所退缩与收敛。新的思想、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得到了成长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救亡图存这一最重要、最急迫的目标之下，原来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便不仅不可能充分伸展，而且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容与目标，使之服从和服务于救亡这个紧迫的目标。倡导启蒙的思想家、政治家以至文学家都面临着处理启蒙与救亡二者关系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只能使启蒙的目标向救亡靠拢，甚至服从救亡，此外别无选择。

历史事实表明，救亡的要求制约着整个中国启蒙运动的进程。从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不同程度地以救亡为出发点。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是因为他坚信“变则存，不变则

亡”。他在《大同书》中提倡平等思想，是因为“人类不平等者，人必愚而苦，国必弱而亡”。梁启超倡言“新民”，乃鉴于君主专制统治造成的“愚陋、惰性、涣散、混浊”的“国民”，不足以与西方的“新国民”抗争。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以激励国人变法自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鼓吹革命，极力宣传和移植代议制政治制度，主要目的也是救亡图存。正是由于民族危亡这一巨大阴影的笼罩，才使得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未能以主要精力从事反对封建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宣传与斗争。这样，无论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总是对启蒙运动的本质与最终依归的背离。再看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曾经鲜明地提出人权的要求，并由此感召了一代进步青年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亦即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来。但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发展，其中很大程度出于反帝救亡斗争的需要，他很快便以民主的口号代替了人权的口号，也就是以十九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民主思想，代替了原先的来自十八世纪欧洲“天赋人权说”的启蒙思想。政治现实性是加强了，启蒙色彩却暗淡了。实际上，稍稍考察中国的启蒙运动史，就可以看到，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与代表人物，无论在哪一时期，也无论属于哪一派别，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与取舍，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先进理论的态度与抉择，大都由救亡图存的需要所决定，还常常随着以救亡为主导的现实政治斗争的变动，而不同幅度地调整自己的态度与取舍抉择的具体内容。

同时，在救亡的大目标下，现实的政治斗争以至军事斗争被置于优先的地位，而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尤其是人的素质的改造与培养，常常只能靠后或靠边，甚至提不上日程。

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在救亡目标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家、民族等等群体的要求，凌越了一切个体的

要求。单个人，在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与新生的名义下，往往成了工具与手段。个人的发展一般不被承认为人的活动的目标。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不可否认，也正是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为西方的反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以至国家主义等等思潮、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东方的专制、集权，如蒋介石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下实行的法西斯专政，开了方便之门。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指出，中华民族的救亡斗争，客观上常常扭曲与淹没中国的质地孱弱的启蒙运动。这里，罪责当然不在我们民族的救亡斗争，而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

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并记得，中国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了。人性解放的要求，人格独立、人权觉醒、理性自主等等的要求也是被扭曲或干脆被压制了。这如同资本主义没能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缺陷。这种缺陷给我们国家、民族随后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三）学习、师法西方思想发生了“时代错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中，曾经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萌芽一定程度的出现，萌发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幼芽。但它们不仅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而且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就其内容来说，也还谈不上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做了酝酿和准备。中国启蒙运动的萌生与形成主要在西学东渐之后。可以说，学习、师法和宣传西方思想，贯串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全过程。

但是，前面说过，中国启蒙运动比之欧洲晚了200年，当它在中国展开时，在欧洲，启蒙时代已经结束。启蒙思想的许多重要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或者凝固于法制之中，或

者积淀为人民共同具有的文化心态。尽管在实践上以至理论上，由于种种的局限，它们在观念与实际之间，或观念与观念之间，还存在这样那样虚伪或矛盾，但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内容已经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扎下了根。西方思想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这时的主流已经不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而是19世纪的理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这时需要的已经不是开辟草莽的理论呼喊和激情满怀的号召，而是要为其在本土以至全球的统治进行理论论证。自由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适应了这种需要。人权、平等、理性等等的观念并没有被抛弃，但是却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或补充。比如人权天赋说便遭到了否定，人权说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科学发展证明了天赋人权说的荒谬。这时思想理论界考察研究的人，已经由“自然”人进到“社会”人，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人权，已由个人的权利，进到群体、集体的权利。人权的要求已转为对国民权、公民权的要求。所以，当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睁眼向着欧洲，寻求完成启蒙任务的思想武器时，强有力地扑入他们眼帘的却是在性质上悖逆于启蒙的上述种种主义和思潮。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时代错位”。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种“时代错位”的实情，让我们概略地考察一下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后期的，以政治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近代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以萌发和盛行于意大利的人道主义为中心的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马克思称之为欧洲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在这一阶段，以但丁（1265—1321）、伐拉（1407—1457，意大利人）、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蒙台涅（1523—1592，法国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复兴欧洲古典文化的口号下，举起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旗帜，提倡人的理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桎梏；提倡个人的现世幸福，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倡重视社会教育和科学知识，反对封建愚昧。这种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点的传播，使长期受神权和神本主义思想奴役的欧洲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身的价值，逐步实现了人格的觉醒。

第二阶段，从17世纪至18世纪，以法国天赋人权说为中心的阶级，也就是通常说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马克思称之为欧洲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而此时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又十分迅速，这就使充当广大第三等级领袖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和整个封建势力处于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要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举起“天赋人权说”的旗帜，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满怀激情地、无畏地向封建制度、教会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们凭借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主权在民，主权为民等进步主张，启迪了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军号角。

第三阶段，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以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中心的阶级。这时的西欧已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和扩大资本的统治。因此，“秩序”、“安全”、“竞争”等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重心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天赋人权说”显然已不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要求扩大政治、经济权

利，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更需要在经济上摆脱土地、金融资产阶级的种种束缚。这时的资产阶级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改革。为满足这样相互矛盾的要求，自由主义便成为这时的资产阶级最适用的思想武器。而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

在19世纪前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边沁、密尔为主要代表。他们公开提出从利益原则出发考虑个人的自由、国家、政治问题。同时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的本性是避苦趋乐”的学说进行改造，增加了利己主义、自由竞争、利益计算、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立宪国家、代议制政府等等新内容。

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思想家以法国和英国的孔德与斯宾塞为主要代表。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完全的胜利和迅速的发展，但其内部矛盾也明显暴露。人们对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感到失望以至愤怒。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武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以抵挡社会主义思潮。恰在此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使那种“新”的理论的出现有了可能。实证主义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信奉和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批判启蒙思想家对理想的追求是梦想，提出用“以实证知识为依据”的实证社会科学指导建立一个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的新社会，企图以此来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达尔文主义问世后，继孔德而起的斯宾塞，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学说。他用庸俗进化论解释社会发展，把人类社会同生物有机体等同起来，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说成是与生物有机体各器官的职能分化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一样，也要进行“生存竞争”，“强存弱汰”。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很

快成为19世纪最时髦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以这种理论为依据，对内强化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加紧了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步伐。斯宾塞的理论在欧洲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理论。

第四阶段，是19世纪后期，在欧洲盛行的国家主义阶段。国家主义在19世纪初的普鲁士就已开始流行。费希特首先把当时极力要从波拿巴王朝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德意志民族愿望表现为国家主义。他声称德意志民族今日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太重视个人观念而忽视国家利益。要救亡，必须自觉地树立事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个人自由也只有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黑格尔发展了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是个有机的整体，个人附属于国家。国家在先，个人在后；国家是目的，个人是手段。他反对卢梭的人类天然平等说，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流行的自由观。鼓吹在法律面前才有平等可言，真正的自由就是法律。李斯特又在经济方面发展了国家主义学说。这些国家主义思想、学说，以及“生物社会学”理论的问世和流行，伴随着德意志帝国于19世纪60至70年代在欧洲的崛起，交相为用地既提高了德国的地位，也增强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力。

以上简略的回顾，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既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方寻求思想武器，又面临着当时的欧洲盛行的已经是实质上反启蒙的思想学说。当时的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由于对欧洲社会和欧洲思想认识上的稚拙，远不是人人都能分得清不同时期的欧洲思想的历史作用。面对繁杂纷纭的欧洲思想，他们既难以从容抉择，其实也常常无力抉择，而容易首先将当时盛行的最时髦、最新的思想学说搬弄过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对外斗争，